

当代德国教育政策研究论丛

总主编 姜 锋

当代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Gegenwärtige Hochschulreformen in Deutschland

主编 姜 锋 Erich Thie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当代德国教育政策研究论丛

总主编 姜 锋

当代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Gegenwärtige Hochschulreformen in Deutschland

主编 姜 锋 Erich Thie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 姜锋, (德) 蒂斯 (Thies, E.) 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 (2016重印)

ISBN 978-7-5446-4091-6

I. ①当… II. ①姜… ②蒂…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改革—德国—文集
IV. ①G649.51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9010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毛小红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4091-6 / G · 1306

定 价: 3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总序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的攻坚时期，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相应的智力和人才支撑。教育承担着历史的重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才兴则国家兴，人才强则国家强。”2007年，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作出了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作出了详细部署。这些战略部署均对我国的教育体制、教育政策和人才培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明确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大方向。教育要传承文化、创造知识、培养人才。教育应营造良好的学习和创新环境，为人才的创新与创业提供充分的养料，培养具有开拓精神、创新精神、人文情怀、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及全球行为能力的人才。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发展有着深刻的全球化印记，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观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功与教训，认清机遇与挑战，使我国在教育改革之路上聚集人类文明的智慧。研究世界教育强国的教育历史与现状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自然资源匮乏，拥有八千多万人口，却创造出世界排名第四的国民生产总值。德国既是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摇篮，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摇篮。迄今为止，德国已孕育出近百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为世界工业强国和科技强国，并岿然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与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完善的教育理念和较高的教育水平是分

不开的。德国教育思想的精髓在于“以人为本”和在此基础上的国家责任。这些思想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约翰内斯·罗伊希林，以他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发表的《蒙昧者书简》，反对当时欧洲大学的经院哲学权威，谴责经院哲学家焚烧犹太书籍的做法，揭露教皇和教会的丑陋行径，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作了很好的铺垫和准备。被誉为“德意志人的导师”的菲利普·梅兰希通是路德最紧密的伙伴，在宗教改革过程中积极推动教育体系改革，使当时的大学实现了人文主义和新教教义的结合，创立了基督新教的大学及中小学机构组织。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对整个德国教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德国孕育了不少在世界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教育学家，例如“现代教育之父”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幼儿教育之父”弗里德里希·威廉·福禄贝尔；“职业教育之父”格奥尔克·凯兴斯泰纳；“师范教育之父”的阿道尔夫·第斯多惠；“德国现代大学之父”威廉·洪堡；等等。纵观数百年的德国教育史，无论哪个时期的教育大师，都始终提倡和传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他们的学说对构建整个教育学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构成德国教育思想的精髓，对当代德国教育仍具有启发意义。

当代德国教育改革活跃，教育科研投入保持连续增长的趋势，教育科研经费预算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近十年来，德国高等教育领域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快速推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有“大学卓越计划”、“博洛尼亚进程”、“高校协定2020”以及“双元制高等职业教育战略”。这些都使德国高等教育得以高速发展，大学生入学率较改革前大幅提升。德国目前已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的第三个理想留学地。外国留学生的占比逐年攀升。

德国不仅是外国大学生向往的留学目的地，也吸引着外国科研人员前往开展科研工作。德国二元制职业教育植根于德国，享誉全世界。其体系完备，实行半工半读制，由联邦、州、行业以及企业四个层面相互监督、共同参与和促进。二元制职业教育凭借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专业人才保障。德国职业教育体现的是教育的经世功能，实用性和人文素质相结合的原则是其关键理念。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研究、借鉴德国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探索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办学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结构，使职业教育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为提升我国整体人口素质做出更大贡献。因此，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探讨如何解决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

“当代德国教育政策研究论丛”把当代德国各教育层面的改革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依托上海外国语大学与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及德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合作举办的论坛，依次就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等热点话题，邀请中德两国教育官员和专家学者进行对话与探讨，重点研究政府职能的转变、教育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教育发展方式及治理方式的转变、教学科研质量的提升、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核心要素等问题，着力推动中德双方在教育政策顶层设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教育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上海外国语大学创建于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自建校以来，学校秉承“格高志远、学贯中外”的校训精神，已发展成一所培养涉外型、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多科性、国际化、高水平特色大学。学

校立足多语种、跨学科、跨文化综合优势,积极践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促进多元文明沟通,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使命,在语言、文学、文化学界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了扎实成绩。目前,上外拥有60余个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以语言政策规划、国际外交战略、涉外舆情研究为核心,聚焦高水平的区域国别研究,主动服务中国对外交流事业,协同创新建设高校学术智库群,构建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成果应用渠道,努力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在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德国国际教育研究所以及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支持下,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14年10月成立了德国教育科学政策信息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要任务在于全方位、多角度聚焦德国教育政策,对德国教育的历史与当下的发展动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希冀为思考我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该中心正在编译德国教育史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时间跨度最大、历史记载最为详实的七卷本《德国教育史》;策划“德国教育大师经典译丛”,按重要教育历史人物、教育学理论精华、教育核心主题三个类别,节选德国教育发展史上最有影响、最为重要的经典作品片段,并附相关评注和提示;编译官方权威文件《德国国家教育报告》;策划“当代德国教育政策研究论丛”;等等。此外,该中心网站还将利用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德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德国各大主流媒体、德国使领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及德国科学基金会等网站的一手资料优势,跟踪德国教育政策动态与实施举措,译介重要内容,为我国政府部门和学界研究提供实时教育动态报告。

我诚挚地邀请各级教育工作者及广大读者关注和支持上海外国语大学德国教育科学政策信息研究中心的科研工

作，关注“当代德国教育政策研究论丛”，衷心希望我国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能放眼世界，借鉴德国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时吸取其失败教训，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改革之路，以更好地贯彻“教育强国战略”。最后我要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教育研究领域尤其是外语教育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本教育论丛的出版也更好地体现了一家专业教育出版社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姜 锋

2015年5月

(代) 前言

德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宏观轮廓

世纪之交，教育全球化的大潮强烈冲击着德国整个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因其与经济和社会的密切关联而首当其冲，效益至上和减少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理念逐渐占据主导方向，由经济界和政府推动的改革自上而下，由外向内集聚，在政府与高校的讨价还价中演进。一些代表德国高教传统的标志性要素被新的模式扬弃，而另一些不被本国传统制度接受的外来体系不仅进入德国，而且“喧宾夺主”，替代了原有结构，通常被国际上认为趋于保守的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在过去近二十年中经历了深刻变革，尤其是过去十多年里经历了转变的“阵痛”后展现出新的格局。概观之，这场变革至今势头虽已减弱，但仍在运行中的改革主要发生在高校管理、教学和科研三个领域，其中高校管理改革的本质特征是简政放权，变政府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赋予高校自我治理的规划、财务和人事权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则分别围绕“博洛尼亚进程”与“大学卓越计划”（或译精英大学倡议）进行，以应对欧洲化和全球化冲击，提升德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实力，适应国家与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提高办学效益。宏观梳理当前德国高教改革的走势，可以看出其基本轮廓，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把握其整体面貌。

改革的前奏：整体共识

1982年10月1日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入主德国政坛具有标志性的日子，这一天刚刚当选总理的科尔宣布了和自由

民主党联合政府的执政理念：“少些国家，多些市场”。这意味着，一切公共的政策和措施都要接受效益标准的检验，高等教育也在这样的趋势下逐步被拉出了象牙塔，接受社会的评判，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被认定已经身患重病：大学管理无力、经费短缺、设备老化、教学内容陈旧、学术活动缺乏学科协同，迂腐僵化，与快速发展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实际脱节；学制庸长无序，毕业学生年龄过大，缺乏活力和创造性，学位与国际通行体系不兼容，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制度性障碍，在英美高校强烈的竞争中丧失了传统的国际学术区位优势。曾担任过政府教育行政高官的爱尔福特大学校长格劳茨在其《芯已腐烂？》一书中（1996年）强烈批评了大学面临的严峻问题，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已迫在眉睫。此书引起德国朝野广泛共鸣。时任联邦总统赫尔佐克更是以促进改革为己任，要求全国“动起来！”，政府应该为教育松绑，“还教育以自由”，高校则要转变理念，弘扬起独立和创新精神，承担时代“事业精英”（Leistungselite）的责任。外交部长金克尔和联邦教育部长吕特格斯联手呼吁，拯救陷于危机的德国高校，恢复德国作为国际高等教育区位优势（Studienstandort）的传统。政府层面自上而下向高校施加改革压力，经济界更是竭力助推改革教育，从外部向教育施压，几乎所有经济组织都参与到教育改革的大讨论中，纷纷发布自己的教育改革声明，并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出各项教育评估，鞭策“平庸的”德国教育，要求教育为德国经济增长做出切实贡献。压力面前，高校在被动中跟进，在跟进中因势利导，承认改革责任的同时，要求政府加大经费投入，简化行政管理，改善高校国内外办学的政策环境和条件，高校校长会议在时任主席埃里克森领导下成了高教改革的核心智库，出台了一系列高校管理、教学和科研改革的建议和决议，

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及多数高校的尊重。世纪交替之际，高校改革已形成德国全国各方的整体共识。

改革的主线：管理、教学和科研三大领域

为便于概观描述，可以从管理、教学和科研三个方面梳理世纪之交以来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三个方面又可以分别以三项工程为例具体简析：设立高校管理委员会（Hochschulrat），推广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Prozess），实施高校精英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

改革前，德国高教管理面临的焦点问题是政府和高校作为两个核心行为者互动“失灵”，导致资源配置失衡，效益不高：一方面，政府部门对高校的管理过多过细，严重束缚了高校的自主能动发展，另一方面，高校领导传统上由各院系主任和教授内部选举产生，甚至轮流坐庄，其学术能力强、学术声望高，但常常管理能力弱，无法应对大学作为“现代大型学术企业”面临的纷繁管理难题。为消除两方面带来的管理弊端，德国政府借鉴美国高校董事会的管理机制，于1998年修改联邦高教法，在高校设立管理委员会，把政府的国家战略、社会的管理经验和高校的管理实际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融合各方智慧和诉求的管理联合体，使高校的发展目标、战略和措施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国家利益。从管理委员会结构上看，各高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半数以上是大学以外的政府部门代表、社会名流和企业精英，另一半或不到一半的成员来自相关学校内部，企业代表往往占主要地位。从管理委员会职权上看，它负责选任大学校长、审批学校的战略规划、在政府下拨的整体预算内（通常三年为一周期，以确保高校自我规划的确定性）审批校级年度预算和教授席位的增设或撤销以及审批新设或撤销专业等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从上述结构和职权上可以看出，政府和高校都要向管理联

合体让渡传统上属于它们的权力，经济界和社会相关领域实质地参与了决策，这从机制上保障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相向发展，缩短了行政决策的过程和环节，在各方共识的基础上提高了管理效益。当然，德国各州负责制订各自的高校管理制度细节，各有侧重，相互间不尽相同，各州高校在高校管理委员会的名称、成员组成以及运作模式等诸方面有细节上的差异。但，这不影响管理委员会的设立是德国高教管理改革标志的判断，它根本上改变了德国高校的传统管理模式和结构，为教学和科研改革提供了保障。

改革前，德国传统大学教育主要在两阶段框架内进行，一是Diplom/Magister阶段（通常被认为与英美体系的硕士阶段相当，为便于理解下称硕士阶段），一是博士阶段，其共同特点是偏重理论和学术，但问题主要集中在硕士阶段。尽管德国大学硕士阶段的教育质量很高，尤其是培养出来的硕士工程师（Diplom-Ingenieur）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誉为德国大学的招牌，但其课程结构不系统，学生一般要6年以上才能学完，毕业时往往已年近30岁，年龄远远大于其它国家的毕业生，企业界对此普遍不满，认为德国大学毕业生朝气不足，有效就业时间太短。不仅如此，硕士阶段课程结构不清，需要学生极高的自主学习组织能力，致使相当多的学生不堪承受苛刻的教学要求，中途辍学率很高（平均在三分之一左右，有些大学或专业则高达一半多），实质上在浪费公共教育资源。企业界不满，政府也同样不满，学生则因不得不半途而废沮丧。1999年6月16日，欧洲三十国教育部长签署推进博洛尼亚进程的协定，以共同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域，提高欧洲高校的竞争力，其主要特征是借鉴英美体系建立大学学士和硕士两级教育模式，并在引进新的教育结构的同时，建立大学教育质量管理体系。对德国而言，新的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意味着对传统模式的深刻挑战，意味着它必须放弃其大学的品牌如硕

士工程师，接受它曾经并不看重的英美模式；就质量管理而言，教授们以往认为自己的教学内容和质量是自己的领地，他人没有水平和资格评论，大学也没有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改革借助博洛尼亚进程不断推进，到2008年德国大学75%的课程已转制到学士、硕士两级模式，目前已基本实现全覆盖（除师范和法律等个别专业外），而且各校在引进英美模式的同时系统开设出英语授课的课程，极大提高了德国高校的国际兼容度、吸引力和竞争力，仅从2006年到2009年的三年间来德学习博洛尼亚模式课程的国际学生人数就上升了一倍，留学生总数则从1995年的14万多上升到2014年的30万多，增幅超过一倍。2005年依法成立的高校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则确立了由政府、经济界和高校代表共同负责管理高校教育质量的体系，确保国家高等教育的基本标准和各校之间教育水平的可比性。综上所述，德国大学从教育模式和质量管理上实现了与自己传统的痛苦诀别，形成了新的格局，取得了明显成效。

2005年7月18日，忙于博洛尼亚模式转制和教学改革的德国大学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这一天，德国联邦政府和16个州的政府首脑共同签署了《大学精英协议》，旨在引进国际水平的竞争机制，支持高校开展尖端研究，持续增强德国在全球的整体学术竞争力和知名度。精英计划是继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德国高校改革发展的又一标志性特征。根据此项计划，高校可从2006年到2017年获得46亿欧元的额外经费。经过激烈竞争，第一阶段共有9所大学因其卓越的未来发展战略方案成为精英大学（“精英大学”非官方称号，但已被国内外广泛接受和使用，第一阶段有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卡尔斯鲁厄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39个研究生院和37个精英科研集群，共计85个精英项目，惠及37所大学。第二阶段

(2010年至2017年), 11所大学成为精英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海德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图宾根大学、康斯坦茨大学、科隆大学、不莱梅大学, 第一阶段的精英大学哥廷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被残酷淘汰出局), 此外, 还有45个研究生院和43家精英集群获得资助。2015年4月, 德执政党联盟决定在2017年以后继续推进卓越大学计划至2028年, 联邦和各州将额外提供40亿欧元建设经费。由此可见, 精英计划将持续影响德国大学的发展趋势。对其实施情况, 尤其是在提升德国高校国际学术知名度方面的作用, 目前没有权威的评估(由国际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最早于2016年提交评估结果), 尚难做出判断。可以看到的是, 精英计划从结构和办学理念上深刻改变着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以往各校各州之间的“和平相处”让位给了“优胜劣汰”, 竞争随着计划的不断推进而越来越激烈; 以往被认为是负面意义的“精英”概念被广为接受、推崇, 争当精英不遗余力, 因为是精英就能获得更多资源, 就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以往各州各校间平均配置资源的“平等和公平”局面让位给强者更强更国际化, 弱者相对趋弱更趋区域化的分化发展格局。应该说, 高校竞争和分化发展有合理性, 因为能够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资源毕竟有限, 需要优化投入, 支持那些能够在国际上站得住、解决人类普遍面临的学术和科技问题的精英大学群, 这意味着国家是否有实力在全球范围内聚集和配置知识资源, 对国家在全球竞争中是否能立于不败之地具有根本的战略意义。2010年至2014年《德国国家教育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德国高校外籍学术人才从2009年的2.86万人上升到2013年的3.81万人, 增幅超30%。这从一个侧面表明, 新计划实施后德国高校聚集全球知识资源的实力在增长, 精英计划已经产生积极效果。主要批评意见则认

为政府的经费不能普惠，只能使少数高校受益，造成并强化了高校间的不公平，高教发展不平衡，使那些原本规模小但有特色的学校在改善科研条件、吸引人才方面处于不利状态；过分强调效益，竞争被简化为包装和标新立异，高校缺乏学术活动需要的平静；过分强调国际化，甚至采用美英标准和使用英语为工作语言，有脱离德国高校实际的形式主义之嫌，弱化了德国大学人文主义传统，效益至上地追求国际标准难免功利主义行为，这不利于学术要自由探索知识的本性得到发挥，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

展望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经历了广泛讨论酝酿，形成了政府、高校、经济和社会各界的整体共识，为改革奠定了理念基础，首先促成了管理制度的转变，提升了高教管理相关方的参与度，增强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密切互动关系，使资源投入更有效地贡献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以实施博洛尼亚模式和精英大学建设计划为抓手的教学和科研改革则在新的管理制度基础上如两翼先后展开，尤其是在最近十年多的时间里猛烈扇动，给传统悠久的德国高等教育带来新的气象。尽管改革还在进一步发展和调适，还没有权威性的量化评估，但“开放、竞争、分化、效益和卓越”已经为新的时代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引起全世界日益增强的关注，提升了德国高校的全球可见度和吸引力。未来，德国高教在经历了剧烈改革的阵痛和快速发展后，将进入对新体系的反思阶段，广为接受的要素得以巩固，效益的原则可能受到公平和质量原则的平衡，各方的博弈还将在改革已经构建的基础上继续，新的体系将逐渐成为德国新的高教传统。

姜 锋

2015年5月

VORWORT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 sind Schlüsselfelder für die Entwicklung vo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Nur mit exzellenten Leistungen in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 können Staaten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bestehen, ihre Wirtschaftskraft stärken und ihren Gesellschaften Lebensqualität und deren Fortentwicklung gewährleisten. Es ist deshalb Aufgabe des Staates, seine Universitäten und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zu fördern. Es ist seine Aufgabe, das richtige Gleichgewicht zwischen der für den Wettbewerb erforderlichen Exzellenz einiger weniger Einrichtungen und der Ausbildungsaufgabe vieler Hochschulen herzustellen, um eine hinreichende Zahl hochqualifizierter, akademisch ausgebildeter Kräfte für Wirtschaft und Gesundheit, Technik und Verwaltung sicherzustellen. Es ist weiter seine Aufgabe, den Universitäten und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den „Raum“ zur Verfügung zu stellen, in dem sie ihre Aufgaben erfüllen können. Hierzu bedarf es hinreichender Haushaltsmittel und klarer inhaltlicher (und nicht nur quantitativer) Qualitätsmaßstäbe, die der Staat zu verantworten hat. Und letztlich ist es auch seine Aufgabe, das richtige Maß zwischen Pflichtaufgaben und der wissenschaftlichen Freiheit zu definieren, die Kreativität fördert und einen phantasievollen und spielerischen Umgang mit Inhalten ermöglicht. Allein hierdurch entstehen neue Ergebnisse. Und das ist schließlich die Idee von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 näm-

lich neue Erkenntnisse hervorzubringen.

Das Symposium über „Zehn Jahre Hochschulreformen in Deutschland und ihre Ergebnisse“ hatte die Aufgabe, ein Gespräch über Hochschulreform zu initiieren zwische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Bildungspolitikern und Wissenschaftlern. Es ist die erste Veranstaltung im Rahmen des neu geschaffenen Instituts für Deutschlandstudien, das von der SISU in China und dem DIPF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Pädagogische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getragen wird.

Das Symposium war wirklich ein Symposium. Es war die Absicht, zu einem Gespräch und unmittelbarem Austausch zwischen den beteiligten Bildungspolitikern, Wissenschaftlern und Medienbeobachtern aus China und Deutschland zu kommen. Und das ist dank eines unkomplizierten und engagierten Zusammenwirkens aller Teilnehmer auch gelungen. Die in diesem Band abgedruckten Beiträge sind also nicht gehaltene Vorträge, sondern stellen die Grundlage von Positionen und Perspektiven dar, über die wir ausführlich gesprochen haben.

Lange Vorträge vergisst man, lebendige Gespräche nicht. Der Leser hat die Möglichkeit, die Positionen und Perspektiven kennenzulernen und sich selbst an dem Gespräch zu beteiligen, das Wissenschaft sowieso darstellt. Ein Gespräch, dessen uralte Anfänge zwischen Dichtung und Erkenntnis liegen und dessen Ende es nicht geben kann.

Erich Thies

Berlin, April 2015